

综 述

我国历代本草研究整理的近况与展望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谢宗万

所谓历代本草,就是指我国过去各个历史时期所编纂或重修的药学著作而言。据《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专题联合目录第八种⁽¹⁾记载,我国现存本草性质的书即有七百余种之多。这些本草,有综合性的本草,也有专门性的本草。历代本草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各有特点,它反映了我国古代医药学家创造出来的独特的药学理论;同时,也反映了由实践而来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和有关药物生产方面的知识,它是我国传统药学的大总结。这些宝贵经验和知识,直到现在很多还是广泛地流传和应用着。不仅如此,它还反映了整个本草学的演进过程。因此,研究整理历代本草,了解它的内容实质,分析、比较其特点,总结药物的理论与实践知识,并从而探讨其演进发展规律,对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来说,肯定是有其重大意义的。

兹将晚近对历代本草研究整理的概况及展望,略述如下:

一、亡佚本草的整复及历代本草发展沿革的探讨

唐宋以前的本草书籍,有些在古代就已经全部亡佚或者部分散佚,只留残卷,但是它的内容有些被转引散存于后世的其它本草之中,欲窥全貌,研究其历史渊源,必先以古本草之整复再现为前提。因此,本草佚书的补辑整复,力求恢复其本来面貌的工作就很有意义。然而辑复工作又不是想像的那么简单,由于古代文献的散佚,后世本草虽有节录,但也有主观删改和增补的,又由于辗转传抄,在文字方面不免有脱漏和差误,这样就对恢复原书的本来面貌带来很多困难。由于历代本草亡佚的很多,因此,在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自然也很多,工作量也很大,可择其重要而又具备一定条件者优先整复。近三十年来,尚志钧⁽²⁻⁴⁾完成了《本草经集注》、《吴普本草》和《新修本草》三部本草的补辑工作,另外,还有《名医别录》、《肘后方》的整复初稿等,其中特别是《新修本草》这一具有世界第一部药典性质的重要本草能够在我国辑成,使之复见于世,可谓本草文献整理工作中的一大成就。可惜,只见到供内部交流用的油印本,尚未公开出版,为美中不足之处。在此以前,虽然清末李梦莹及其子李浩

也曾补辑过,但只是手稿性质。近人范行准也从事过此项工作,亦未见其刊行。

关于《名医别录》,张涤华⁽⁵⁾曾专门撰文探讨它的亡佚及其辑本。在台湾,那琦、谢文全《重辑名医别录》已公开刊行。

古本草不仅为研究我国传统中医药所必需,而且它早已为国外人士所重视,并对它加以研究。如日本森立之等在补辑《神农本草经》之后,又进行了《重辑神农本草经集注》的工作,冈西为人任在其《宋以前医籍考》中就讲到此事,谓曾补辑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七卷,但未见刊行。后来他又在别处提到此项工作,“盖阅九岁而未为完稿也”。说明《重辑神农本草经集注》的工作尚未最后完成。

日本小島知足、中尾万三与冈西为人等都做过《新修本草》的辑复工作,其中成就比较显著的要推冈西为人,他补辑的《重辑新修本草》⁽⁶⁾,1964年在台湾出版,正文之后还附印“关于复原新修本草之考察”以表明辑书之所据。该书且有日本学术图书刊行会(1978)的版本⁽⁷⁾,朱墨分书,对原《本草经》记载的药物,印成红字,以表“朱书神农”之意。

必须指出,在整复工作中,对补辑中存有争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和讨论,确是必要的,这对整复工作的质量将会有所提高。曹元宇⁽¹⁸⁴⁾曾撰文论《本草经》佚佚的药,尚志钧和高晓山均提出《神农本草经》中原有七情^(8,9)内容的线索,可供进一步研究《神农本草经》的参考。本草的辑复工作,不仅依靠正支直线进行,而且还要注意旁支、引证的线索,如此全面考虑,才能客观地接近本来面貌,才能真正的反映当时的医药学的水平和成就。

本草文献的研究和整理,除佚书的辑复工作以外,本草的校勘和注释工作也不容忽视。《本草纲目》在我国有很多版本,各个版本的附图也不一样。人民卫生出版社^(10,11)注意到了这一点,曾两次(1957、1974)对它作了校勘,特别是从1974年开始的全面校勘工作,目前已出版校点本⁽¹¹⁾三册,就是采用刊印较早的1603年(明万历31年)夏良心刻的“江西刊本”为蓝本,旁校

各本进行校勘排印而成。“金陵刊本”现存者有二部，一部在日本，一部在我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金陵刊本”的药图，是所有《本草纲目》版本中最原始的图版，1933年日本《头注国译本草纲目》⁽¹²⁾中采用的药图，即来自“金陵刊本”。1979年日本还将金陵胡承龙本与合肥张绍棠本的药图都分别单独印成专册⁽¹³⁾由春阳堂出版。鉴于“金陵刊本”和“江西刊本”都是《本草纲目》早期的版本，二者在药图方面究竟有无差异，笔者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就“江西刊本”来说，有它的优点，它改正了“金陵刊本”的一些错误，同时也有缺点，那就是“金陵刊本”本来不错反而被改错。因此可以说“江西刊本”的药图是从“金陵刊本”临摹而来，极大多数基本一致，对品种鉴定参考来说，除极个别者外，不会有什么出入，其不同之处亦有之。如牡丹、月季花、百合、茉莉等，其花在“金陵刊本”为粗放，而“江西刊本”则较精致；芍药，“金陵刊本”绘了一朵花，而“江西刊本”则画了两朵花；杜若，“金陵刊本”绘有总状花序，而“江西刊本”则没有画出花序；橙、柚，“金陵刊本”明确绘出单身复叶，而“江西刊本”在临摹时误绘成单叶；巴旦杏，“金陵刊本”原有三个果实，“江西刊本”把这三个果实误画成三片叶子；苋，“金陵刊本”叶尖，图错误，而“江西刊本”叶钝，图正确；野苋，“金陵刊本”图正确，而“江西刊本”图错误。既然“江西刊本”与“金陵刊本”仍然存在一些即使是细小的差异，因而“金陵刊本”原图就仍有单独印成专册之必要。《本草纲目》的校订工作，在台湾也有进行，曾出版《新校增订本草纲目》上、中、下三册，系由甘伟松增订。关于《本草纲目》的版本问题，黄胜白曾专门撰文^(14,15)对正本（金陵刊本）与误本（张刻本）进行对照，指出误本的改说与改图部分，以恢复正本的本来面貌。在此以前，赵橘黄也曾对《本草纲目》的版本进行过研讨。

医药文献版本与校勘研究的重要性，毛春翔⁽¹⁶⁾曾述及由于医师忽视版本校勘，因而轻信误本造成误开药方的事例。彼谓明初有一医家，曾以古方中“汤”（汤即糖）字因后世流传版本误刻为“锡”字，未作校勘，遂嘱病家以锡入汤剂中，以致错用误人，不可不以为鉴。

《滇南本草》⁽¹⁶⁾的校勘，是在云南省卫生局的支持下进行的。1959年出版了第一卷，1977~1978年出版了第二和第三卷，同时还修订了第一卷。这部历史悠久而具有临床经验的地方性医药名著，在校勘之后，纠正了由于过去多次刻钞、增补以及版本残缺所造成的错误，而且还记录了一部分少数民族的医药经验。

是我国药物学上极为宝贵的材料，得到药学界的好评⁽¹⁷⁾。

在民族药方面，1975年拉萨市藏医院对藏医藏药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探讨⁽¹⁸⁾。最近王镭⁽¹⁹⁾在“古代藏医学史略”一文中，介绍了有关藏药的古代文献《四部医典》和《晶珠本草》的作者、成书年代、收载药物种数及其在藏药论著中的学术地位等。1977年，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医院等⁽²⁰⁾在整理传统蒙医蒙药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蒙古族人民长期以来积累的带有地区和民族特点的适应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丰富医疗经验，总结出蒙医论治有清、解、温、补、和、汗、吐、下、静、养十法，还有燥黄水、杀粘虫、练热、提温等独特的治疗法则，蒙药的药理有二性、六味、八质、十七能等内容。总结这一套系统的理论知识，将对蒙医蒙药进一步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979年5月，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医药卫生工作者们从哀牢山区采访到民间流传下来以彝文记述的彝族医药书，这是1916年的抄本，而最早的本子应是明代嘉靖四十五年的写本，距今约有四百余年。从现存的抄本看来，这部近5000字的彝族医药文献，载有54个病种，87个处方，324味药，并体现为一病数方、一方数药和一药数用，甚为珍贵。于乃义等⁽²¹⁾在进行研究以后，撰文对其内容作了简介和评价，并特别谈及对新兴科学“仿生学”的意义。

出土文物的研究，对探讨上古时期药物的产生与发展有重要意义。马继兴^(22,23)等对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全部14种医学方技书包括《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进行了研究，对这些医书中所记载的药物加以统计，得知当时所用药物就在395种以上，方剂283个，仅以药物数目来说，就比现存的《神农本草经》药数至少要多30种，而且其中不少药名都是未见于《神农本草经》的，反映了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药物方剂的应用已是相当广泛的了。至于某些专门性的本草如《海药本草》⁽²⁴⁾、《食疗本草》⁽²⁵⁻²⁷⁾等，也专门有评介性的文章（对综合性的主流本草研讨和评介性的文章最多）。

在历代本草发展沿革的探讨方面，龙伯坚的《现存本草书录》⁽²⁸⁾收载了现存本草书278种，简要地介绍了各书的组织内容，主要特点，并摘录历代文献中有关该书的记载。赵橘黄在五十年代曾结合过去本草教学编写过本草学讲义，对历代本草在我国医药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价值有所评述。马继兴在中国本草学源流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早在六十年代，就写出《中国本草学源流》⁽²⁹⁾（初稿）。他还在其编著的

《中医文献学基础》⁽³⁰⁾上册(1978年油印本)中专门写有“本草学著作”一章,对我国各个不同时期的主流本草,探讨其编写年代、流传情况、内容特点等,某些方面,提出了他本人的见解。在台湾,那琦著有《本草学》。

在我国医药刊物中简要叙述我国历代本草发展概况的文章较好的有裴鉴的《历代本草及其作者简述》⁽⁸¹⁾。以药学史为名编写出版的有北京中医学院的《中药简史》⁽⁸²⁾和渠时光编的《中国药简史》⁽⁸³⁾。

在日本,白井光太郎著有《本草学论考》⁽⁸⁴⁾三卷,探讨了中、日本草沿革。冈西为人著有《中国医书本草考》⁽⁸⁵⁾和《本草概说》⁽⁸⁶⁾,特别是后者,它对日本和本草学的形成和发展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阐述了两国本草发展史上的一些联系之处。

以上所述,无论是中国的著作或者是日本的著作,对总结历代本草发展规律和为将来系统地编写“中国药简史”或“中国本草发展史”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955年,李鼎在“考察本草的著述修订和改移”⁽⁸⁷⁾一文中就说过“整个本草史,表示了祖国医药的悠久的伟大的光辉传统,现在正为我们正确的继承和发展”。

历代本草的发展与植物学的发展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楼之岑等在其《本草学对植物学发展的某些影响》⁽⁸⁸⁾一文中,就提到了本草学对我国植物学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李时珍对植物的观察非常细致,已能认识到许多同种植物间,特别是繁殖器官间的相似性,对植物分类、形态、生态诸方面都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知识,开创了我国植物形态学的先河。陈家瑞在其《对我国古代植物分类学及其思想的探讨》⁽⁸⁹⁾一文中论及李时珍是运用墨家荀子分类思想的光辉典范,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我国古代植物分类学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凡此,均足以表明历代本草的发展不仅发展了祖国药学,而且还促进了植物学的发展,是对整个科学发展的又一贡献。

海洋药物是中国医药学伟大宝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向大海要药”,发展海洋药学事业,已逐步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在关美君写的“海洋药物的动态、特点、展望”⁽⁴⁰⁾与丁源写的“祖国医药学与海洋药物的关系”⁽⁴¹⁾一文中谈到了古籍中有关海洋药物的记载,从历代本草看海洋药物的发展、海洋药物历来应用概况以及海洋药物新的用途等内容,为我们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利用海洋药物资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展现了我国海洋药事业的光辉前景。

此外,本草学对畜牧兽医学也有关系,刘寿山曾

研究“李时珍《本草纲目》对畜牧兽医的贡献”⁽⁴³⁾,即使从兽医角度来看,本草的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

中药文献浩如烟海,崔万钧撰写的《中药文献概述》⁽⁴⁸⁾一文,重点介绍了中药的主要文献,包括类书、丛书、古典著作等,可供从事本草文献整理研究时的参考。

二、本草与医方中中药材品种的考证

科学地考证并确定本草药材的原植(动)物品种,不但对如实反映用药的历史事实,研究药物的历史变迁有所帮助,而且对正确地继承古人药物生产和临床应用经验有现实意义。考证古代药物产地与正确的考证当时所用的中药品种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李鼎⁽⁴⁴⁾曾对本草经药物产地通过考证作过表释。王孝涛⁽⁴⁵⁾在研究唐代《千金翼方》中记载的地道药材对唐代某些药材产地作了古今对照。王筠默⁽⁴⁶⁾对宋代药物的产地分布作了研究。

中药品种的本草考证,在我国有关医药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有价值的文章,例如当归⁽⁴⁷⁾、黄芪^(48,49)、地黄⁽⁵⁰⁾、鹤虱⁽⁵¹⁾、常山⁽⁵²⁾、红花⁽⁵³⁾、荆芥^(54,55)、白头翁⁽⁵⁶⁾、苍术⁽⁵⁷⁾、白术⁽⁵⁷⁾、钩藤⁽⁵⁸⁾、黄芩⁽⁵⁹⁾、甘松香⁽⁶⁰⁾、夏枯草^(61,62)、枳实⁽⁶³⁾、熏草零陵香⁽⁶⁴⁾、王不留行⁽⁶⁵⁾、败酱草^(66,67)、南烛^(68,69)、莽草⁽⁶⁹⁾、地不容⁽⁶⁹⁾、威灵仙⁽⁷⁰⁾、白前⁽⁷¹⁾、白薇⁽⁷¹⁾、徐长卿⁽⁷²⁾、芫花⁽⁷³⁾、黄药子⁽⁷⁴⁾、牛膝⁽⁷⁵⁾、仙鹤草⁽⁷⁶⁾、功劳叶⁽⁷⁷⁾、虎掌⁽⁷⁸⁾、金钱草⁽⁷⁹⁾、天花粉⁽⁸⁰⁾、川楝皮⁽⁸¹⁾、五加参⁽⁸²⁾、细辛⁽⁸³⁾、杜衡⁽⁸³⁾、灵芝⁽⁸⁴⁾、鸬鹚菜⁽⁸⁵⁾、何首乌⁽⁸⁶⁾、降真香⁽⁸⁶⁾、曼陀罗⁽⁸⁷⁾、东廬⁽⁸⁸⁾、凤眼草⁽⁸⁹⁾、石打穿⁽⁹⁰⁾、零余子⁽¹²⁸⁾、蜜虫⁽⁹¹⁾、山蚕⁽⁹²⁾等,特别是在澄清中药混乱品种方面,起到了古为今用的作用。

赵思兢⁽⁹³⁾从研究中药不能割断历史,要重视继承性这个观点出发,他就现时广东地区使用的一些草药在考证本草之后,发现古今药名不符(同物异名)的有66种之多,即认为原是老品种,但现已改名换姓,被误认为是新品种——草药,如现名寮吊竹和白毛藤的草药,实即《神农本草经》中的徐长卿和白英,腊肠豆即唐《本草拾遗》中的阿勒勃,九层塔即宋《嘉祐本草》中的罗勒等。此外,还就前人对发菜、穿破石、积雪草和赤地利这四种药的本草考证结果提出了订正的意见。

1965年,徐文⁽⁹⁴⁾对《本草纲目》中所载的某些虫类药物加以诠释,如青蚨即龙虱,毛虫又名天浆子(雀甍)等。又林乾良⁽⁹⁵⁾等对几部重要本草以及《内经》、《伤寒》、《金匱》等重要医书中使用的动物药种数分别予以统计,对了解古代使用动物药概况有所帮助。

1958年刘波⁽⁸⁶⁾对我国古籍包括历代本草中记载的一些菌类作了考证,并述及菌类的利用、毒菌鉴别和解毒方法等,认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菌类上所积累的材料是极其丰富的。

六十年代,冯国楹⁽¹⁸⁸⁾在曾育麟发掘整理的《玉龙本草标本图影》⁽⁸⁷⁾的基础上,对所载药物的原始标本,鉴定了拉丁学名。1978年,潘锦堂⁽⁹⁸⁾和罗达尚⁽⁸⁹⁾对《晶珠本草》、《四部医典》和《无垢晶串》等文献中收载的一些藏药,进行了品种考证。1980年郑金生⁽¹⁰⁰⁾对南宋王介著的《履巉岩本草》就其明代抄本(现存北京图书馆善本库)从其彩图考证了当时新增药品22种的原植物学名,还讨论了该书的特点和贡献,并指出书中部分图文不符和名实不符之处。

中药品种的本草考证,若以专著而论,赵燏黄早年编著的《中国新本草图志》⁽¹⁰¹⁾(第一集,1932;第二集,1934)、《祁州药志》⁽¹⁰⁸⁾(菊科及川续断科,1936)和《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¹⁰⁸⁾(华北之部)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日本中尾万三、木村康一合编的《汉药写真集成》⁽¹⁰⁴⁾,将中药材摄成照片,进行了考证研究和学名鉴定。新中国成立之后,谢宗万编写了《中药材品种论述》⁽¹⁰⁵⁾,叶橘泉等编写了《本草推陈》^(106,107),高铭功编写了《黑龙江省中药名实图考》⁽¹⁰⁸⁾,江苏省中医研究所等编写了《江苏中药名实考》⁽¹⁰⁹⁾,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编写了《本草整理研究》⁽⁶⁹⁾(1~5册),云南省卫生局对《滇南本草》的品种,参考了《滇南本草图谱》诸书并结合当地采集的实物标本进行鉴定和考证研究,重新注释整理了《滇南本草》⁽¹⁸⁾三卷,已如前述。武汉大学生物系在其编写的《本草纲目简编》⁽¹¹⁰⁾一书中对《本草纲目》所载部分药物在书后表列了它们的拉丁学名,计植物药747种,动物药157种。吴征镒、裴鉴、周太炎、黄胜白和陈重明等对《植物名实图考》所收载的植物均作了比较深入的考证研究,其考证结果,部分见载于《中国药用植物志》、《本草整理研究》⁽⁶⁹⁾、《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等专著中。《本草纲目拾遗》一书的部分药物品种,解放前张宗绪曾考证过,但考证品种不多,现杨竞生正深入考证中。1956年,刘寿山曾就《神农本草经》中的矿物药(44种)撰文简介⁽¹¹¹⁾,1962年,刘友梁又将历代方书中所记载的矿物药和丹药的资料,根据现代科学实验分析,结合前人在药学上的经验理论,对80种矿物药和丹药的矿物来源作了考证,整理并出版了《矿物药与丹药》⁽¹¹²⁾一书,使古今学说得到相互参考印证。

外国学者对我国本草感兴趣,并对其药物品种作过考证研究的还有 F. P. Smith⁽¹¹³⁾, G. A. Stuart⁽¹¹⁸⁾,

E. Bretschneider⁽¹¹⁴⁾, 伊博恩(B. E. Read)⁽¹¹⁵⁾、小野兰三、白井光太郎、石户谷勉⁽¹¹⁶⁾、牧野富太郎、松村任三⁽¹¹⁷⁾、中尾万三、木村康一、高桥真太郎⁽¹¹⁸⁾、难波恒雄^(119~128)、滨田善利⁽¹²⁴⁾。有的是发表专著,有的是注释本草,有的是发表专题论文(如续断⁽¹⁸⁰⁾、漏芦⁽¹²¹⁾、鹿蹄草⁽¹²⁸⁾、紫菀⁽¹¹⁸⁾、术、海蛤⁽¹²⁴⁾、文蛤⁽¹²⁴⁾、马刀⁽¹²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日本出版了《头注国译本草纲目》⁽¹²⁾,对绝大多数药物的来源、产地等加以考证。从1974年起,又重新全面加以校订⁽¹²⁵⁾,对原订药物学名作了不少修正。在西方,伊博恩等人在美国人米尔斯(R. Mills)工作的基础上,与刘汝强、朴柱乘等人合作,于1928~1941年间分阶段地把《本草纲目》的卷8~37、39~52,总共44卷(占全书总卷数的86%)的内容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和研究,对《本草纲目》所列出的药物尽可能地鉴定其学名,述明有效成分并参考中外著述予以解释,附以中外药名索引。1935年还编写出版了《本草新注》一书,收药898种,也是取材于《本草纲目》。1946年又出版了关于我国明代的《救荒本草》的译述⁽¹²⁶⁾,除译成英文外,对其中414种植物,做了学名考证,并附有关的化学资料等。在对我国重要本草所收药物的品种考证方面,日人森村谦一⁽¹²⁷⁾对我国《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的新增品种,考订表列了拉丁学名。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学者难波恒雄于1980年编著的《原色和汉药图鉴》⁽¹¹⁹⁾,对其所收载的451种药物,每篇均有本草考证,颇有参考价值。

关于明·刘文泰等著的《本草品汇精要》,也是一部重要的本草书,共四十二卷,该书是明代唯一的官修本草,原有五彩药图1358幅,原本早已流落海外。现香港和罗马各有一部⁽⁸⁸⁾。香港者系明·弘治原本,黄绢题签为《御制本草品汇精要》,罗马者系清代摹写本,题签无“御制”二字。国内仅北京图书馆藏有该书药图部分残卷。今后如能将原图影印出来,正式出版,以供学术上的考证研究,肯定是有相当大的价值的。

本草单味药的考证,如上所述,显然是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古方药物的品种考证,也很要紧,它有利于医方的发掘与继承。叶橘泉曾着重分析药物在医方中的作用,并通过临床验证及参考本草文献中对药物形态的记载,考证《金匱要略·吐衄下利篇》紫参汤方中所载之紫参,应为蓼科蓼属拳参之近缘植物,而不是百合科蚤休(七叶一支花)⁽¹²⁹⁾。他还考证了古方“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中之连翘,认为应是草本连翘,而后世时方“银翘散”等所用的连翘才是木本连翘⁽¹⁸⁰⁾。另外形态相似的药物通过总结疗效和进行科学研究,

也是考证古方药物的一个重要途径。例如宋代以前本草中所述的青蒿包括黄花蒿 *Artemisia annua* L. 和香蒿 *Artemisia apiacea* Hance 两种。通过青蒿素的化学、药理研究及临床验证,则可以肯定晋·葛洪《肘后方》中治疟的青蒿无疑当为黄花蒿而非香蒿。因黄花蒿含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而香蒿则不含。

不但古方中药物可以通过总结疗效的途径来考证品种,而一般药物品种有条件的亦可参照进行,如王概^[181]《辨凝水石与方解石》一文就说明了以方解石误作寒水石的渊源与后果。

中药里的“十八反”是中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十分重要的用药经验,其中大戟、芫花、甘遂反甘草的问题,由于现时大多数地区应用的大戟为茜草科红大戟 *Knoxia valerianoides* Thorel. 而不是古代应用的大戟(京大戟) *Euphorbia pkinensis* Rupr. 因而有人在大戟反甘草的问题上就提出与前人不同的结论,实际上是他所用实验材料与前人所用的药材品种不同之故。诸如此类,像这样涉及一些重要问题的是非澄清,中药品种考证,就收到了在实际应用上的效果。

(待续)

参 考 文 献

(1) 中医研究院、北京图书馆合编: 中医图书联合目录, 专题联合目录第八种, 1961。(2) 陶弘景原著, 尚志钧辑校: 本草经集注, 芜湖医学专科学校印, 1963。(3) 吴普著, 尚志钧辑: 吴普本草, 芜湖医学专科学校印, 1961。(4) 唐·苏敬等撰, 尚志钧辑校: 补辑新修本草(油印本, 上、下册), 芜湖医学专科学校油印本, 1962。另有皖南医学院油印修订本。(5) 张涤华: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54, 1963。(6) 唐·苏敬等撰, 冈西为人辑: 《重辑新修本草》, 老原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湾, 1964。(7) 同上, 学术图书馆行会刊, 日本, 1978。(8) 尚志钧: 神农本草经中的“七情表”探讨, 内部资料。(9) 高晓山: 一节《神农本草经》佚文的考证, 内部资料。(10) 李时珍著: 本草纲目(上、下册), 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 1957。(11) 李时珍著: 本草纲目(校点本)第一、二、三册,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5, 1977, 1978。(12) 白井光太郎、牧野富太郎等: 头注国译本草纲目, 春阳堂(日本), 1933。(13) 李时珍原著: 本草纲目附图上卷(金陵胡承龙刊本); 本草纲目附图下卷(合肥张绍棠刊本), 春阳堂(日本), 1979。(14) 黄胜白: 药学通报 10(5):235, 1964。(15) 黄胜白、陈重明: 植物分类学报 13(4):51, 1975。(16) 兰茂著, 云南省卫生厅(局)整理: 滇南本草, 第一卷, 1959, 1975; 第二卷, 1977; 第三卷, 1978, 云南人民出版社。(17) 于乃义等: 医学史与保健组织 1(1):24, 1957。(18) 拉萨市藏医院: 西藏医药(1):12, 1975。(19) 王镭: 中华医史杂志 10(2):116, 1980。(20) 内蒙古自治区(蒙)医院、中(蒙)医研究所科教办公室: 新医药学杂志(7):3, 1977。(21) 于乃义等: 云南哀牢山区发现的彝族医药文献考评并联系祖国民族医药史的初步探讨, 内部资料, 1979。(22) 马继兴: 药学通报 14(9):423, 1979。(23) 马继兴: 中华医史杂志 10(1):41, 1980。

(24) 冯汉埔: 医学史与保健组织(2):122, 1957。(25) 中尾万三: 食疗本草之考证,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 1卷3号, 1930。(26) 陆曼炎: 新中医药 7(7):29, 1956。(27) 朱寿民: 新中医药 8(5):16, 1957。(28) 龙伯坚: 现存本草书录,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7。(29) 马继兴: 中国本草学源流(初集手稿), 1956。(30) 马继兴: 中医文献学基础(油印本)上册, 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印, 1978。(31) 裴鉴: 药学通报 3(3):98, 1955。(32) 北京中医学院: 中药简史, 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 1960。(33) 渠时光: 中国药学简史, 沈阳药学院、辽宁省药学会、辽宁省药物研究所刊印, 1979。(34) 白井光太郎: 本草学论考(第一、二、三卷), 日本, 1933。(35) 冈西为人: 中国医书本草考, 井上书店, 日本, 东京, 1974。(36) 冈西为人: 本草概说, 大阪创元社, 1977。(37) 李鼎: 中华医史杂志(2):90, 1955。(38) 楼之岑、宋之珙: 本草学对植物学发展的某些影响, 内部资料, 1979。(39) 陈家瑞: 植物分类学报 16(3):101, 1978。(40) 关美君: 海洋药物通讯(1):1, 1979。(41) 丁源: 祖国医药学与海洋药物的关系, 内部资料, 青岛市医药科学研究所印, 1979。(42) 刘寿山: 中国畜牧兽医杂志(2):63, 1956。(43) 崔万钧: 中草药通讯(11):45, 1976。(44) 李鼎: 医史杂志 4(2):184, 1952。(45) 王晓(孝)涛: 上海中医药杂志(4):40, 1956。(46) 王筠默: 医学史与保健组织(2):114, 1958。(47) 赵燏黄: 药学报 4(2):161, 1956。(48) 赵燏黄等: 药用黄芪本草学及生药学的研究, 1~25页, 科学出版社, 1959。(49) 肖培根等: 药学报 11(2):114, 1964。(50) 赵燏黄等: 药学报 1(1):29, 1955。(51) 赵燏黄等: 药学报 5(1):59, 1957。(52) 刘宝善等: 常山生药学的研究, 内部资料, 1957。(53) 楼之岑、刘美兰: 药学报 4(3):233, 1956。(54) 诚静容: 药学报 3(3):307, 1955。(55) 毛华训等: 药学报 3(2):195, 1955。(56) 徐国钧等: 药学报 4(1):25, 1956。(57) 徐国钧等: 药学报 4(4):313, 1956。(58) 侯宽昭: 药学报 4(1):7, 1956。(59) 宋万志等: 药学报 7(1):25, 1959。(60) 徐岩等: 药学报 5(4):269, 1957。(61) 苏中武等: 药学报 6(5):113, 1958。(62) 谢宗万: 两种夏枯草的形态鉴别及学名考证, 中药研究资料选编, 第一辑, 259~265, 1972。(63) 叶橘泉: 江苏中医(5):19, 1957。(64) 叶橘泉等: 江苏中医(3):10, 1957。(65) 徐炳声: 药学报 7(2):65, 1959。(66) 徐炳声: 药学报 12(8):533, 1965。(67) 黄胜白等: 浙江中医药(3):35, 1977。(68) 李维祖: 中药通报 5(3):86, 1959。(69)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 本草整理研究(1~5册),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印, 内部资料, 1973~1977。(70) 李家实等: 药学报 15(5):288, 1980。(71) 谢宗万等: 药学报 7(5):175, 1959。(72) 黄胜白等: 浙江中医药(5):28, 1977。(73) 谢宗万: 药学报 6(6):356, 1958。(74) 谢宗万: 药学通报(2):66, 1960。(75)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第一研究室: 牛膝类中草药的品种调查及原植物研究, 中药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 198~211页,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印, 1972。(76) 谢宗万: 龙芽草的本草考证与原植物的研究, 同上, 247~253页, 1972。(77) 谢宗万: 药学通报(1):10, 1978。(78) 胡世林: 植物分类学报 15(2):69, 1977。(79) 谢宗万等: 中药通报 5(1):26, 1959。(80) 乐崇熙等: 药学报 14(11):641, 1979。(81) 陈俊华等: 药学报 7(1):10, 1959。(82) 傅克治等: 刺五加本草源流考, 内部资料, 1979。(83) 吴照美等: 北医学报(台湾)(6):1, 1974。(84) 陈俊华等: 药学报 15(4):239, 1980。(85) 曾呈奎等: 药学报 9(3):180, 1962。(86) 叶三多: 南京药学院学报(10):39, 1964。(87) 何传毅等: 湖南医药杂志(3):54, 1980。(88) 高开平: 辽宁中医杂志(6):42, 1980。(89) 徐治国: 中医杂志 21(5):

634, 1980。(90) 赵克鲁: 新中医药 7(5):45, 1955。(91) 江苏省中医研究所: 江苏中医(5):18, 1957。(92) 张崇洲等: 中医杂志 21(6):66, 1980。(93) 赵思兢: 研究中药先不要割断历史, 内部资料, 1980。(94) 徐文: 上海中医药杂志(8):15, 1955。(95) 林乾良等: 浙江中医学院通讯(1):42, 1977。(96) 刘波: 生物学通报(6):19, 19580。(97) 曾育麟整理: 玉龙本草标本图影,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9。(98) 潘锦堂: 中草药通讯(1):46, 1978;(2):39, 1978。(99) 罗达尚: 中草药通讯(12):33, 1978。(100) 郑金生: 浙江中医杂志 8:338, 1980。(101) 赵燏黄: 中国新本草图志, 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 第一集, 1932; 第二集, 1934。(102) 赵燏黄: 祁州药志, 第一集(菊科及川续断科), 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课, 1936。(103) 赵燏黄: 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华北之部), 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中文报告汇刊, 4(1):21; 4(2):131, 1937。(104) 中尾万三等: 汉药写真集成, 第一、二辑,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 第一卷, 第二号, 1929; 第一卷, 第五号, 1930。(105) 谢宗万: 中药材品种论述(上册), 上海科学出版社, 1964。(106) 中国医学科学院江苏分院: 本草推陈,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1。(107) 叶竞谿: 本草推陈(续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3。(108) 高铭功: 黑龙江省中药名实图考(油印本), 内部资料, 1959。(109) 江苏省中医研究所药物研究室等: 江苏中药名实考,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9。(110) 武汉大学生物系: 本草纲目简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8。(111) 刘寿山: 上海中医药杂志(9):36; (11):35, 1956。(112) 刘友梁: 矿物药

与丹药,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2。(113) Stuart: Chinese Materia Medica, 1928。(114) Bretschneider: Botanicum Sinicum, 1892。(115) B. E. Read, et al: Chinese medical plants from the Pen-T'sao Kang-Mu, A botanical, chem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reference list. 1st ed. Peking, 1923; 2nd ed. Peking, 1927。(116) 石户谷勉著, 沐绍良译: 中国北部之药草(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 1950。(117) 松村任三: 植物名汇汉名之部, 日本东京丸善书店发行, 1915。(118) 高桥真太郎等: 药学研究 33(5):341~343, 1961。(119) 难波恒雄: 原色和汉药图鉴(上)、(下), 日本保育社, 1980。(120) 难波恒雄等: 药史杂志 7(1.2):1, 1972。(121) 难波恒雄等: 药史杂志 5(2), 1970。(122) 难波恒雄等: 生药杂志 34(1):25, 1980。(123) 难波恒雄: 生药杂志 32(4):232, 1978。(124) 浜田善利等: 药史杂志 13(1):1, 1978; 14(2):53, 1979; 15(1):1, 1980。(125) 李时珍原著: 校订新注国译本草纲目, 春阳堂(日本), 1974。(126) 马堪温: 欧美研究中医药史及近年情况简介, 内部资料, 1978。(127) 森村谦一: (日本)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集, 719页, 1978。(128) 那琦等: (台湾) 私立中国医药学院研究年报(9):329, 1978。(129) 叶橘泉: 江苏中医(12):28, 1961。(130) 叶橘泉: 江苏中医(7):22, 1962。(131) 王概: 江苏中医(11):35, 1961。(132) 冯国桐: 云南药检汇报 7(21):1, 1963。(133) 毛春翔: 古书版本常谈, 第8页, 中华书局, 1962。(134) 曹元宇: 江苏中医(11):29, 1963。

田七治疗眼前房出血70例疗效观察

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眼科医院 胡兆科 古洵清 李长海 李勋赤 温树灶

眼前房出血常发生在眼球外伤或内眼手术之后。轻者经治疗后数天内可吸收, 严重者可致患眼失明, 甚至须摘除眼球。根据中药田七有祛瘀活血止血作用, 我们用田七液作直流电离子导入法治疗眼前房出血70例(70只眼), 收到一定效果, 现报道如下。

一般情况: 本组70例中, 外伤性前房出血48例, 内眼手术后前房出血22例。男性56例, 女性14例。患者年龄在11~25岁之间者33例。用本法治疗前, 病程长者30天, 短者1天, 6天以上者43例。有47例前房出血液平面在3毫米以上, 其中7例为全前房积血, 且其中3例合并有青光眼。16例前房有血块, 3例既有前房出血, 又有血块。

治疗方法: 全部病例均用酒精提取的田七有效成分加蒸馏水配制成10%田七液, 作直流电离子导入治疗, 用眼科杯法(Selinger氏法)从负极导入眼内, 电流量为0.4~1.5毫安, 每次治疗30分钟, 每天1次, 病情重者每天治疗2次, 每次治疗前患眼滴0.5%的卡因1次, 导入时患眼要睁开。继发青光眼者给口服醋唑磺胺, 局部滴缩瞳药。

治疗效果: 用本法治疗后, 次日即见前房出血开始吸收, 眼部症状逐渐好转。本组70例中, 除2例出血性青光眼手术后患者各治疗12次无效外, 其余68例前房出血均治愈, 平均出血吸收时间为4.09天, 治愈率为97.14%。治疗期间未见有复发出血及炎症等不良反应。

典型病例:

例一: 甄×, 女, 19岁, 住院号: 28900。因左眼外伤6天入院治疗。检查: 左眼视力光感, 角膜透明, 暗红色血块占鼻侧半前房, 眼内看不进。用田七液直流电离子导入治疗5天, 前房血块由逐渐溶解至全部吸收, 视力恢复到1.2, 出院。

例二: 林某, 女, 61岁。住院号: 15621。左眼老年性白内障在本院做晶体囊外摘术。术后第6天发生前房出血。用热敷、维生素K、强的松等治疗14天, 前房出血不吸收。检查: 左眼视力光感, 前房积血6毫米, 瞳孔区为出血及渗出物覆盖。用田七液直流电离子导入治疗5次(每天1次), 前房出血全部吸收, 矫正视力0.4⁻¹。